

【探索与争鸣】

# 社会学经典的去殖民化： 与中国社会学家对话

(美)迈克尔·布洛维/著 尹丹婷/译

【作者简介】迈克尔·布洛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译者简介】尹丹婷，欧盟伊拉斯谟世界计划“4CITIES”(欧洲四城)城市研究硕士。

【原文出处】《清华社会学评论》(京),2023.第20辑.1~15

去殖民化的过程正像野火一样在美国学术界蔓延开来。每所大学都不得不反思其过往历史中与白人至上主义的合作，例如这所学校是否建在从原住民手中征用而来的土地之上，抑或是以奴隶制的收益为基础，又比如校园中是否以雕像、肖像或建筑物命名的种种方式在缅怀某位种族主义者。一种要求通过重新分配物质和智识禀赋为过往的压迫做出补偿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学术部门中，有人呼吁对教学大纲和课程进行去殖民化，特别是对学术经典进行去殖民化。

历史一直是这场去殖民化运动的核心。起源于《纽约时报》的“1619年计划”将美国历史重新追溯到奴隶制的起源，而非1776年的《独立宣言》。这成为这场去殖民化运动的导火索，将大量的历史学家推入公共领域的讨论中，为关于奴隶制遗产的主张辩护或争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段黑色历史被放置到日光下感到愤怒至极，继而创建了“1776委员会”作为反击，以被美化的历史作为所谓“爱国教育”的基础。这一委员会后来被拜登总统终止，但围绕“去殖民化”的政治斗争仍在继续，“批判种族理论”，包括“1619年计划”的文件，在学校里仍然是被禁止的。

各个学科都被迫审视自身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学家一直在从事“去殖民化”的工作，逐渐意识到他们与殖民主义的共谋，以及关于被殖民者观

点中的去人性化，而那些更具有科学血统的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审视自身历史的进程则相对缓慢。那些植根于主张西方思想普遍性的学科，如哲学或政治理论，也不大乐意揭开它们的过去，但也并非丝毫不受影响。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到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去殖民化运动的影响逐渐减弱。即便如此，后者的学术生态也逐渐对学者和学生十分有限的多样性越来越敏感。

社会学自然也逃不开这种批判性的自省。从一开始，社会学就认可或忽略了19世纪更广泛的社会语境，尤其是帝国的背景。随着这门学科开始聚焦社会不平等，它必须更加自觉地意识到它本身所维持或忽视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争论围绕着传统上定义了我们学科基础的权威人物的相关性展开。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都是欧洲白人男性，他们的著作横跨19世纪和20世纪初，但都将种族和性别问题边缘化了。他们的思想根植于帝国秩序中，却留下了太多没有被问题化的议题。一场关于如何看待这些学科权威人物的争论如火如荼。

## 一、回应经典的策略

去殖民化，即意味着承认、批判和消除经典文本中殖民化预设的存在，揭露植根于大都市经验的、有缺陷的普遍主义主张，这些主张忽视了殖民统治的模式以及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对去殖

民化运动有四种相互竞争的回应:复原、拒绝、革命和重构。

至少在美国,复原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许多人继续将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理论作为社会学的参考点和基础。很多社会学家在这些经典人物的作品中受过教育,多年来一直在教授他们的理论,因此更倾向于投入到其连续性上。但他们的坚持不仅仅是某种惯性。这些经典理论在19世纪下半叶与市民社会一起出现,主张反对国家和市场的过度扩张。当我们回到19世纪后期,我们能看到迅猛发展的经济不平等,并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是一段随即迅速消失的进步性时期(Piketty, 2014)。当我们看到全球威权政权的萌芽,当我们看到劳动力、自然、金钱和知识的市场化在不断更新和深化,当我们通过数字化和社交媒体热情地参与日常生活的商品化从而帮助强化和教唆监视和控制,简而言之,当市场和国家逐渐侵占自治的市民社会时,经典理论远非与现实脱节,而是作为一种堤坝以及抵抗运动的灵感承担着越来越重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本质上是一场反殖民运动,反对国家和市场对市民社会的殖民化(Polanyi, 1944; Habermas, 1985)。

并非只有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主张提升市民社会的重要性,那些坚持复原主义的学者已经准备好了承认其他一直徘徊在经典边缘的人——齐美尔、米德、弗洛伊德——而如今,古典理论的课程还包括了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等女权主义者和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等学者。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学者的思想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被阐释利用。复原主义者正是通过这样的让步来调和那些要求废除学术经典的人的诉求。

接下来让我转向拒绝经典。这一举措有两条主要路径。一方面,有一些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家重点关注帝国作为社会学出现的重要背景,及其与种族和性别的关联。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经典因未能充分强调该背景而可能遭到批评。但同时他们也认为,与一些主要社会学家相关联的“经典”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任何所谓根本性的思想都是排他的,而

去殖民化必须意味着包容性。例如,Julian Go(2016)提倡他所谓的观点现实主义,它拥抱观点的多元性,并且不基于作者的种族或性别来认可其观点,而是关注他们所采用的立场。认知正义取代了认知定式,对于建立在不同视角上的相互竞争的理论是否成立,并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这并不意味着经典思想家被扫到一边,只不过是请他们从圣坛上下来,所谓“百花齐放”。

后殖民批判是拒绝经典的一条路径,另一条路径则是那些遵循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格言(1916)的科学家所信奉的:“对其创始人感到难以忘怀的科学注定是迷失的。”这些实证主义者驳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不是因为他们的白人男性欧洲中心主义,而是因为他们过时的方法论和过时的理论。这些经典人物可能具有历史意义,但与已经覆盖其起源的当代社会学实践并无关联。这些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型来发展社会学的科学家在大数据的推动下,在学科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分别遵循两条路径的后殖民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在拒绝经典这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可能在其他方面持敌对观点。

接下来,让我转向对经典的第三种回应,我称之为革命性的回应。其核心想法是用新的经典替代旧的经典。有许多新经典的候选人被人们提及,但至今还没有人能匹配杜波依斯的资历。杜波依斯在1895年成为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是一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写作专业文章、抒情散文、诗歌、小说和戏剧。他是一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全球知名的公众人物,在民权运动和泛非主义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与倡导和平的活动家。奥尔登·莫里斯(Aldon Morris)在他的《被否定的学者:杜波依斯与现代社会学的诞生》(*The Scholar Denied: W. E. B. Du Boi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ology*)一书(2015)中将杜波依斯视作美国社会学真正的但从未被承认的创始人,原因在于,杜波依斯所创立的亚特兰大学派比芝加哥学派早了整整20年,却因为学科内的种族主义未受到认可。同样重要的是,他最后50年的写作不仅

以种族和阶级为中心,还充分聚焦了帝国主义。在莫里斯的影响下,Jose Itzigsohn和Karida Brown(2020)以“种族化的现代性”为话题,推进了以杜波依斯为经典的社会学。在这种回应中,人们通过将社会学植根于杜波依斯的作品来重构经典。

我认为上述这种革命性的举措有些太过激进,我们面临着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同倒掉的风险。即使我们承认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在种族和性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上的观点是很受限制的,但它们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它们不仅代表了一种抵抗市场和国家的政治立场,而且正如亚瑟·斯汀康比(Arthur Stinchcombe)(1982)曾经写道的那样,它们仍旧可以被视作科学研究的典范,作为取代陈词滥调的、对复杂性的深刻理解,作为开展实证研究的研究问题和假设的来源。学科内奠基性的学者必然会忽略某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在后来变得很显著。他们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跨时代的韧性,在于它们如何能够适应新的挑战、如何能够被重建以应对当下的危机。一门学科,就像一门科学一样,有其基本的假设,并能够从中不断发展重构出新的研究项目,以适应和消化内部矛盾和外部变化。这是我将在这次演讲接下来的部分中详细阐述的重构主义立场。

## 二、一种经典的理论

在重构经典之前,我们显然首先需要一种经典理论。我相信经典理论是由四种属性定义的:它是根本性的、历史性的、地理性的和相对的。我将依次讨论这四种属性如何适用于社会学。

### 1. 经典是根本性的

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理论中所共有的过往经典的根本性原则是什么?我姑且提出四点。第一,它们具备一种历史性的观照,因此提供了一种预测未来的方式。第二,它们拥有道德基础,这些根基对认识世界及其可能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第三,它们拥有独创的方法论,使社会学家能够以独特的方式把握世界,这在一些范例研究中得到了证明。第四,它们具备一种概念性框架,定义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及其再生产和转型理论。我相

信这些根基仍旧影响着当下的社会学。即便这种联系并不总是可见或直接的,我们在各个社会学子学科中探究的主题本质上都可以追溯到由这些经典理论家所奠定的基本准则。

但为什么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应该被视为奠基人物呢?为什么我们要依赖于这些在一个多世纪前著书立说的人物?首先,他们当时正在经历并反思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占据霸权的时期,而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着的世界,即旧秩序最终被消解,其他的可能的新秩序被充分抑制的时期。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许多方面我们正在回到那个早期的历史阶段。其次,他们每个人都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因此他们必须证明他们的存在是正当的,要不断抵抗竞争性学科的敌意,他们必须阐明在接下来一个世纪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中很轻易就被我们丢失了的哲学、道德和科学准则。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社会学提供了道德指南和科学基础。最后,这些理论家的立场是反对市场和国家的异化、商品化、剥削、排他主义的倾向,并以不同的理论体系捍卫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理想。

### 2. 经典是历史性的

这些奠基性的准则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经典有其自身的历史,且在这段历史形成前还有一些零散的实证经验。经典最初是由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37)的自发行动理论建立的,该理论基于马歇尔·帕累托、韦伯和涂尔干著作中偶然的相似之处。这些人物成为奠基性的人物,但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帕森斯自己在发展结构功能主义及其相关的现代化理论时就放弃了马歇尔和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建构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这些基础建立的前提是将社会团结在一起的潜在价值共识和所有社会必须履行的四种功能。结构功能主义的前提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猛烈抨击,新兴的斗争不仅出现在美国,还席卷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批判性种族理论推翻并结束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统治性地位,并创造了一种新的经典——一种基于冲突而非和谐的经典。涂尔干和韦伯并没有被排除在

外,而是在二者的相互比较中不断被重读。同时,人们还开始阅读马克思——一位帕森斯曾不屑一顾的人物的著作,因为前者的思想局限于19世纪。

### 3. 经典是地理性的

如果我们说经典是历史性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那么我们还必须考虑它是不是地理性的,即是否随着它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而变化。一方面,有部分人认为经典是“西方的”或“北方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关联。他们可能支持的是一种不受西方经典玷污的“本土”社会学的发展。Raewyn Connell(2007)对此观点做出过具体阐述,她主张一种和北方理论划清界限的“南方理论”,具体反映南方世界的现实状况。她拟出了一份学者名单,包含一些自称但大多数并非社会学家的学者,而这群人往往被北方的学界忽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对所谓北方社会学的某种狭隘性的重要纠正,但话说回来,她提到的理论家大部分时间实际上都是在北方度过的,往往是在北方接受了教育,所以很难不受到北方理论的影响,因而使得她所倡导的彻底的两分是无法成立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领域,其中西方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但同时也包含西欧,占据霸权地位但同时也并不排除其他社会学的可能性,它们在全球领域内争夺着一席之地,并试图定义其自身的国家社会学。在这种观点中,冲突的焦点不在于“本土”和“支配社会学”之间,或是在“南方理论”和“北方理论”之间,而是发生在支配社会学的领域。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并非拒绝经典,而是针对特定的背景对其做出重新解释,甚至需要“本土化”北方经典本身,审视其自身的政治经济背景(Chakrabarty, 2000)。这样,各种国家的社会学就可以各自从韦伯、涂尔干和马克思那里汲取不同的养分,形成对其作品的不同阐释,从而带来对经典的多样重构。

### 4. 经典是相对的

经典不仅是根本性的、历史性的和地理性的,同时也是相对的。重构经典不是仅仅叠加另一位理论家的问题。经典不是简单加总,它由其各个组成部

分的理论之间的关系组成。因此,塔尔科特·帕森斯对经典的看法是基于各位理论家思想中相似的基础性的原则,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理论框架,植根于对涂尔干和韦伯的具体解读以及对马克思的有意识的排斥。然而,当马克思被放置回经典的框架的时候,我们并非要排除涂尔干和韦伯,而是要将其放置在和马克思的对话中。这就意味着对涂尔干和韦伯的新的解读。我们不再仅仅通过集体意识来解读涂尔干,而是开始通过劳动分工的异常形式来解读他的思想。于是一个崭新的激进的涂尔干在旧的保守主义的涂尔干的灰烬中重生,预测着社会主义的未来,即一种以职业群体为中心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我们不再通过韦伯的不同类型的行动和价值观的中心性来阅读他,而是开始将他视为一位关于支配和国家理论的思想家。韦伯的历史变成了某种理性化的实现,即支配与效率的独特组合。社会学不再被视为某种同质的、单一的学科,它成为各种相互竞争的研究项目施展的空间。经典所提供的根本性原则是多样性而非趋同的起点。

帕森斯所提出的一种用单一性研究来全面定义社会学的想法,在他最疯狂的想象中或许的确定义了社会学,但不可避免地带有极权主义的意味。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这种社会学的总体化的愿景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吵吵闹闹的学科,其中没有人占主导地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竞争性的结构比之前的单一性框架更加稳定。即便如此,后者仍受到去殖民化运动的猛烈批评,其中,杜波依斯即重建经典的特洛伊木马。

### 三、由杜波依斯进入经典重构

经典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以回应当时那些挑战了价值共识、和谐、意识形态终结和现代化的理论假设的社会运动。经典并非抛开了韦伯和涂尔干,而是意味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对其展开新的阅读。如今,我们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尤其但不仅仅是在美国——这些运动呼唤着我们对种族不平等与种族不公以及气候变

化、流行病、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关注。杜波依斯之所以成为最可能被纳入经典的社会理论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生活和理论深受其种族的影响。但杜波依斯不仅是“某个种族的人”,他还是泛非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和平活动家;他是一位社会学家,但同时还受过历史学和哲学的训练;他不仅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将杜波依斯纳入经典,带入与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的对话,将极大地改变社会学。接下来我将试图勾勒一下这些对话可能以何种形态展开,以及它们对社会学有着怎样的影响。

### 1. 涂尔干与杜波依斯

奥尔登·莫里斯(Aldon Morris)(2015)在一项研究中重点关注了杜波依斯写作《费城黑人》(*The Philadelphia Negro: A Social Study*)(Du Bois, 1996[1899])时期及亚特兰大学派。当时,杜波依斯立志成为一名专业社会学家,遵从他在柏林大学读书时从其老师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那里学到的方法,进行细致的、根植于历史的实证社区研究。当时的杜波依斯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其基础性理论上都是涂尔干式的。杜波依斯的研究呈现了主要由非裔美国人聚居的费城第七区作为城市病态的典型场景,展示了由移民和种族歧视造成的社会解体,不由得让人想起涂尔干提出的强迫性的、失范性的劳动分工。杜波依斯提出了涂尔干式的道德诉求,敦促白人意识到黑人上层阶级的存在。杜波依斯声称,黑人中“有才华的十分之一”与白人精英有相似的文明意识。在杜波依斯的分层理论中,他和涂尔干一样,非常重视教育作为历史中的进步性力量,尤其是其对非裔美国人进步的影响。

除了《费城黑人》外,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Du Bois, 1989[1903])中令人动容的论文也受到了社会学的关注,尤其是他提出的“双重意识”的概念——生活在面纱之中的非裔美国人还被迫用白人压迫者的目光来审视自身。凯伦·菲尔兹(Karen Fields)(2002)提出了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与杜波依斯的《黑人的灵魂》的相似性,认为杜波依斯和涂尔干都是作为被歧视的他

者在体验着世界:他们一位是非裔美国人,另一位是犹太人。很多时候,社会学对杜波依斯的探讨就到此为止,忽略了他接下来60年成果颇丰的职业生涯。

杜波依斯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种族主义感到忧心忡忡,同时布克·华盛顿与白人精英的妥协令他愈发感到绝望。在研究资源越来越难以积累的同时,杜波依斯逐渐对科学对于黑人解放的作用失去了信心。总体而言,发现自己并不能说服白人相信非裔美国人同样也是人的杜波依斯选择了在1910年离开亚特兰大大学。之后,他转向了政治,联合创建了著名的民权组织(NAACP),并成为杂志《危机》的编辑。在接下来的24年中,他都没有离开该职位。1909年,他为激进派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撰写了一本传记《约翰·布朗》(*John Brown*)(Du Bois, 1996[1909]),以支持在哈珀斯·费里(Harpers Ferry)反抗奴隶制的一次失败的起义,而这次起义被视作美国内战的一次预演。杜波依斯在赞扬约翰·布朗的文字中主要传达的信息是,黑人解放的代价固然高昂,但绝没有被压迫本身的代价那么大。这是一个全新的杜波依斯,在这里,他终于意识到非裔美国人的解放不能依靠他人,而只能依靠他们解放自身。

### 2. 韦伯与杜波依斯

接下来,我们转向杜波依斯在《暗水》(*Darkwater: Voices from within the Veil*)(Du Bois, 1999[1920])中对韦伯的含蓄批评。这本文学社会学合集以一篇著名的文章《白人的灵魂》开篇——这是与之前那篇《黑人的灵魂》的刻意对比。杜波依斯已经放弃说服白人,让他们相信非裔美国人也是人,而是反过来向非裔美国人证明白人是非人道的,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中得以体现——欧洲国家为了控制和剥削非洲相互斗争。他认为,如果我们认为西方文明是优越的,那是来源于其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暴力剥削——对人类、艺术珍品、原材料和思想的窃取盗用。杜波依斯所描述的西方历史与韦伯对理性化及其宗教起源的描述截然不同。在韦伯看来,暴力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可能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和扩张中,暴力完全被清除了,现代资本主义仅仅基于形式上的自由劳动、

会计、家庭和工作的分离、法律制度和科学的应用。对于杜波依斯来说,资本主义的暴力,尤其是种族暴力,从未停止过。

《暗水》中的文章坚信人类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于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参与式民主和财富均等化。杜波依斯关于“男人的统治”“女人的诅咒”和“工作与财富”的论文均指向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但前提都是首先要解决种族问题。他批评了那个时代许多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人,认为他们没有认真对待种族问题。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实现另一种平等主义,如果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即“肤色更深的种族”被排除在外的话。马克斯·韦伯对社会主义的承诺——自由、平等和民主,持更深的怀疑态度。对于韦伯来说,社会主义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任何达成社会主义的企图只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即理性化和官僚主义的加剧,自由和民主的消亡。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将成为部分官员的专政,而非所有工作者的民主统治。杜波依斯和韦伯都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其中一位拥护社会主义,而另一位则对之不予理会。

### 3. 马克思与杜波依斯

《暗水》代表着一个乌托邦式社会主义者的杜波依斯。他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愿景,但除了通过工人阶级统一的、自发的行为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来实现它。而对于工人如何实现自发行动,杜波依斯没有提出清晰的路径。除了没有阶级形成理论,杜波依斯也没有提出关于资本主义将如何动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意味着他必然要等待他的马克思主义时刻的到来。尽管杜波依斯在1892-1894年在德国读书时曾参加过社会民主党的会议,也曾接受过柏林大学的教授们关于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的教诲,但他似乎从未真正严肃地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更不用说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了。直到1926年杜波依斯第一次访问苏联之后,他才一头扎进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关于美国内战的写作。这导致杜波依斯在20世纪30年代巨大的志趣性转变,为他在1935年出版的杰作《美国的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Du Bois, 1998

[1935])提供了重要的灵感。这与当时主流的历史学派背道而驰,使得历史学家们还需要整整30年才能赶上杜波依斯的思想。

美国内战(1861-1865年)之后的重建时期(1865-1877年)一直被历史学家以及(白人)大众视作一场彻底的灾难,他们认为将非裔美国人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只会导致腐败和混乱。杜波依斯站出来,对这一传统勇敢地提出了反对立场。早在1910年,他在《美国历史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已经指出了内战后重建的种种好处:选举权的扩大让非裔美国人得以成为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并带来了包括扩大全民教育在内的进步性立法。在《黑人的天赋》(*The Gift of Black Folk*)(Du Bois, 2009 [1925])中,杜波依斯写到了非裔美国人从种植园到北方军队的种种贡献。这些主张后来在《美国的黑人重建》中以全新的理论框架再次出现。

《美国的黑人重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开篇,分析了美国内战的起源。以英国为主的纺织制造商对棉花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为奴隶制带来了土地和人口的巨大压力,进而威胁到了北方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这可以说是内战的开端,而其后续发展则主要靠杜波依斯所说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被奴役人口的“总罢工”来推动,这场罢工使得他们被允许加入北方军队,因而战争逐渐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为了表彰非裔美国人做出的重要贡献,林肯于1863年宣布《解放宣言》生效,该宣言即预示了战后的一段时期的重建。杜波依斯逐州考察了跨种族民主在这段重建时期的发展——他也称之为“废除民主”(abolition democracy)——以及资本主义本身如何能够创造超越种族秩序的可能性。而当奴隶制在北方被废除后,北方资本随即对如何促进南方非裔美国人的福祉失去了兴趣,这导致北方军队撤出南方,南方民主的进程因而被搁置,甚至发生了逆转。此后,南方被交还给昔日的种植园主阶级,他们着手建立了吉姆克劳的种族隔离秩序,通过建立白人所谓“公共和心理”工资将白人工人吸引到白人资本的一边。在整篇论文中,杜波依斯采取了阶级分析的视角来研究那些破坏和重建种族秩序的力量。

杜波依斯的研究很有效地展示了马克思的思想如何能够被有效地重构并适用于分析美国历史上的这一关键时刻。杜波依斯并不将重建时期视作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而将其视作一次壮阔的失败。非裔美国人在重建时期的斗争所预示的某种真实的乌托邦,已将杜波依斯从《暗水》里想象的乌托邦中解放出来。

杜波依斯在罗斯福新政期间继续保持着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提出了非裔美国人社区应该利用种族隔离的现状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合作共同体。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杜波依斯进一步将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向了全球,将他的泛非主义思想与非洲蓬勃发展的反殖民运动结合起来。同时,他成为当时国际和平运动的一位领袖,并选择站在冷战中苏联的那一边。因此,他成为美国政府的敌人,被指控私下为外国机构提供情报。在1951年的审判中,该案因缺乏证据而被驳回。气急败坏的美国国务院在接下来的8年中都拒绝为杜波依斯出具护照,而苏联和中国则向杜波依斯敞开了大门。杜波依斯公开支持苏联和中国推动国际社会主义的发展,并支持非洲和亚洲的反殖民运动。他在美国的公民身份逐渐变得岌岌可危,最终他在1961年加入了共产党并前往加纳以表示对美国政府的不满。1963年,他在加纳去世,享年96岁。

#### 四、今日社会学:重构经典与去殖民化社会?

以上即为对杜波依斯非凡的人生与思想的快速回顾。在其中我们能看到如何从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的视角来阅读杜波依斯,进而形成对他的著作更为理论化的系统的认识。这一过程同时也引导我们重新阅读杜波依斯之前的经典,在这里我不再赘述。但我想要试着简单概括一下杜波依斯对传统社会学经典提出的五个挑战。

1. 一门解释性科学,透过全球性和历史性的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除了阶级外,也将种族纳入研究的核心,从奴隶贸易开始,一直延续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2. 一门道德科学,提供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的维度,但同时呼吁对不断变化着的、阻挡人们实

现这种可能的种种限制条件进行反乌托邦分析。

3. 一门反思性科学,社会科学家全然置身于他们所研究的世界之中,同时又身处各种各样的研究领域。

4. 一门跨学科科学,通过辨别学科边界以跨越边界,尤其注重社会科学、历史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

5. 一门公共科学,将社会学推出学术的茧房,通过构建公共辩论和公共问题进入公共领域。

将杜波依斯带入与经典的对话有彻底变革社会学的可能,但前提是我们对杜波依斯的生活和工作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进入经典的一种可能的代价在于,我们仅仅考虑了杜波依斯早期的经验主义,而忽略了他的一些更为激进且重要的作品,这会大大削弱他的影响力。

严肃对待这样一种激进的社会学,即意味着承认这里生发出的观点,尽管呈现在普遍的、全球的语境下,但本质上是来自北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的观点。从中国社会学的角度看,杜波依斯进入经典意味着什么?这种重建对于关于中国的研究,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研究有怎样的相关性?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所描述的重建是学术帝国主义的表现吗?中国社会学家或许对杜波依斯对于学术的贡献没有兴趣,而更愿意发展出更符合本土现实情况的、自己的经典。尽管杜波依斯的研究充分展现了全球视野,以及他对苏联、中国和要求独立的非洲抱有认同并对美国政府秉持敌意,但杜波依斯的社会学仍然来自美国,即便其在美国处于边缘地位。因此,中国社会学家确实有可能会质疑杜波依斯与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的相关性,而更致力于发展一种抛开西方经典的本土社会学。无论是否去殖民化,经典仍然是西方的。或者,中国社会学家可能希望继续对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展开实证研究,而不受东西方经典研究的兴趣所在的束缚。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些关于经典的讨论都是无关紧要的,就如同在巴黎城内燃烧着熊熊大火时在一旁点燃火柴。

然而,西方霸权无法被我们如此简单地抛在一边。其背后支撑着它的是对这种霸权感兴趣的国

分配的制度性资源。举例来说,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学排名系统旨在将中国大学的学术质量与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做比较。而这些“世界一流大学”往往就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培养了大量获得诺贝尔奖和其他学术奖项的学者,以及在“高影响因子”“国际性”(主要是美国)期刊中具有高引用次数的学者。世界上各个国家也会根据自己的大学在全球排名中的位置来评估这些大学并相应地分配奖励。而这些都是巩固美国霸权的方式。

而美国学术界的全球霸权在中国社会学的领域内不断被再生产,导致中国本土社会学本身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领域,这引起了西方社会学的不同兴趣。那些从美国或欧洲的学术训练中受益的人可以在中国大学获得工作,他们对美国的霸权及其经典的延续或许会感兴趣。正如萨里·哈纳菲(Sari Hanafi)曾经写过的那样,西方的霸权让世界其他学者陷入了两种选择:在全球出版发表并在本土被消解,或在本土出版发表并在全球被消解。只有少数人能够挣脱这两种选择。

在一堆排名、评估和审计的纷繁复杂中,我们绝不能忽略了社会学的意义。对经典的去殖民化——对社会学的殖民化起源及其如何在当代社会学中再生产形成自觉——的确是一种进步性的、令人兴奋的、迟来的发展,但它不应分散我们对社会学在社会去殖民化中的作用的注意力。通过杜波依斯的视角重新阅读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今天的这种社会学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本文根据2022年5月8日迈克尔·布洛维讲座“再构社会理论经典:从马克思到杜波依斯”的讲稿修改而成。作者感谢龙彦的邀请得以完成这篇文章,感谢谢雯、徐晓宏、郇菁、郑作或的批评意见。

#### 参考文献:

[1]Chakrabarty, Dipesh.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Connell, Raewyn. 2007. *Southern Theory: 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UK: Polity.

[3]Du Bois, W. E. B. 1910. "Reconstruction and Its Benefit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5(4), 781-799.

[4]Du Bois, W. E. B. 1989[1903].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5]Du Bois, W. E. B. 1996[1899]. *The Philadelphia Negro: A Social Stud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 Press.

[6]Du Bois, W. E. B. 1996[1909]. *John Brow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7]Du Bois, W. E. B. 1998[1935].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8]Du Bois, W. E. B. 1999[1920]. *Darkwater: Voices from within the Veil*.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9]Du Bois, W. E. B. 2009[1925]. *The Gift of Black Folk: The Negroe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 New York: Square One.

[10]Fields, Karen. 2002. "Individuality and Intellectuals: An Imaginary Conversation between W. E. B. Du Bois and Emile Durkheim." *Theory and Society* 31(4), 435-462.

[11]Go, Julian. 2016.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Habermas, Jürgen. 1985.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3]Itzigsohn Jose and Karida Brown. 2020. *The Sociology of W. E. B. Du Boi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4]Morris, Aldon. 2015. *The Scholar Denied: W. E. B. Du Boi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ology*.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5]Piketty, Thomas.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6]Parsons, Talcot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7]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8]Stinchcombe, Arthur. 1982. "Should Sociologists Forget Their Mothers and Father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7, 2-11.

[19]Whitehead, Alfred North. 1916. "The Organization of Thought." *Science* 44(1134), 409-419.